

SHANDONG CAIZHENG
XUEYUAN XUESHU WENCONG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经济史中的 国家组织结构变迁： 以明清王朝为例

郭艳茹 /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 结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

郭艳茹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郭艳茹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6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ISBN 978 - 7 - 5095 - 0728 - 5

I. 中… II. 郭… III. 经济史 - 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F1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9818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60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198 000 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2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0728 - 5/F·0589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袁一堂 黄 琦

副主任委员：聂培尧 王玉华 綦好东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华 王培志 王传荣

孙秀清 刘正林 刘瑞波

曲吉林 李来胜 闫庆悦

吕玉芹 吴国华 毕秋丽

杨德新 岳 军 袁一堂

聂培尧 曹洪军 黄 琦

黄 磊 韩庆华 綦好东



总序

ZONG XU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以下简称《学术文丛》)是山东财政学院为集中展示财院学人学术研究成果而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学术文丛》的出版,对于落实山东财政学院“学科立校”与“人才强校”的发展战略,繁荣学术研究,加强同学术界的交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始建于1986年、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的山东财政学院,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由财政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创办、实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普通高等财经院校。学校目前拥有14个二级学院,39个本科专业,2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MBA、MPA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已形成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文、法、理、工等六大学科门类相结合的学科结构。其中财政学、会计学、金融学、企业管理、国际贸易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山东省重点学科,财政学与企业管理为省级重点强化建设学科。在山东省政府确定的“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中,财政学位列其中。依托于以上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一批批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脱颖而出,学校也因此成为省内著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经济与管理学研究人才高地。

在人才培养方面,山东财政学院广纳全国英才,以“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两万多名优秀毕业生。其中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或被中央国家机关和著名公司录用,或考取名牌高校研究生继续深造。目前山东财政学院的毕业生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为学校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学在山财”已成为莘莘学子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山东财政学院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既是“求是崇真、博学笃行”的校训与“高标准、严要求、好校风、有特色”办学指导思



想得以落实的必然体现,也是学校实施“学科立校、人才强校、开放兴校、依法治校”战略,积极推进以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为核心的综合改革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多科性高水平特色大学,学校在启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同时,启动了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工作上层次、上水平。围绕这一目标,学校不断优化学术环境,提倡学术民主,创新学术激励机制,科研工作取得重要突破,并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向外界推介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繁荣学术研究,校领导审时度势,决定出版《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学术文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编辑出版的。

为使《学术文丛》反映、代表我校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学术文丛》在书稿的遴选过程中,严格学术标准,规范评审程序,采用了校外专家审稿与校学术委员会评审确定的机制,最终确定入选《学术文丛》的书稿。经此严格的筛选,这一部部书稿以其较高的研究水准与学术价值得以入选。应当指出的是,这些书稿不仅集中反映了我校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展现了我校学人的时代风采。在入选者中,既有名气较大的知名学者,也有砥柱中流的学术中坚,还有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在他们中间,或术业有专攻,或名气有大小,或起点有高低,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瞄准学术前沿,不畏路途艰辛,治学严谨,用力勤苦,最终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一部部书稿凝聚了作者多年来潜心学术研究的心血汗水,展现了财院学人勇攀学术高峰的时代风貌。

我们相信,《学术文丛》的出版不仅在加快学术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建设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加强同学术界的交流、扩大学校的学术影响力等方面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今后我们还将每年遴选10部左右的书稿出版,推动我校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兴盛,薪传不息。

《学术文丛》的顺利出版,得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经济理论出版中心的张立宪先生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诸多辛劳,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学术文丛》的出版过程中,山东财政学院校领导高度重视,校科研处精心组织,各位作者积极配合,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山东财政学院学术文丛》编委会

2008年2月28日



序

xu

黄少安

在当前的制度研究中，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历史。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经济史学在美国产生后，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不断出现有影响力的作品。中国丰富的制度历史是难得的研究题材，对它的研究也许能证实或证伪重要的理论假说，从而有重要创新的可能。但是，目前却缺乏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制度历史的深入研究。郭艳茹的这部重要著作以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工具，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明清王朝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非常有价值。

作者主要研究了以下三个内容：

1. 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分裂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家是一个企业的类比，同市场中的企业一样，会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国家范围的扩大会产生相应的收益，例如，军事防卫力量上升，人均公共品分摊成本下降，市场扩大，抵御风险能力提高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交易费用的上升，即由于疆域扩大、人口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偏好多样性上升所导致的国家管理费用的增加。国家的均衡范围位于范围扩大所带来的收益和所产生的成本在边际上相同的点上，偏离这一点，国家即处于不稳定状态中。中国历史上抗御游牧民族、统一治水、共同市场等需求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强大动力，而在前现代条件下维持辽阔疆域统治所面临的高昂交易费用又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力。国家的统一分裂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

2. 统一王朝的产权结构是怎样变迁的？或者说，一个统一王朝在高度的社会管制和财政集权的制度起点上，怎样一步步走向管制失效和集权丧



失？为了降低统治费用维持国家稳定，明清统治者确立了一套高度管制的制度体系：通过对基层社会的严格管制来减少社会多样性，降低管理成本，并以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来保障管制资源的获得。但是，不断内生的管制成本却使得这种管制型制度体系逐渐走向解体。官员利用信息优势，开始在正式的财政收入之外获得非正式资金收入，从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财政分权，国家财政权力在边际上逐步流失。为了获取非正式资金收入，农业区的官员会加重对基层社会的征敛，而商业区的官员则更倾向于促进商业活动，这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农民负担加重、商业发展、财政分权、官僚腐败等诸多现象，都是管制型制度体系本身所内生。

3. 在国家组织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形态是怎样变化的？明清管制型制度体系产生了管制租金或权力租金，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力资本投入租金的攫取。这不但导致了生产性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产出下降，而且使得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寻租特征，在长期历史时期中持续发挥作用，抑制社会产出。

以上这些内容或问题，都是很重要、很值得研究的。作者虽然是以中国明清王朝作为研究案例，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理论框架（或者至少可以一般化），来解释国家范围的变化、国家产权结构的调整以及这个过程的社会文化形态演变。逻辑清晰，结构严谨，体现了作者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研究功底。在许多经济史的作品中，作者常常罗列大量的史料而缺乏理论的概括和提炼能力，这部专著避免了这样的缺陷。作者在整体理论框架完成后，又通过4个专论对涉及问题进行了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使得全书结构简洁、明朗，而研究又不流于肤浅。

任何对历史的研究，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人们认识现在和思考未来。这部专著对历史制度变迁的研究，同样能启迪人们思考当代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在制度研究中，具有足够的历史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制度变迁过程通常涉及很长时间，在足够长的历史时期内观察、理解制度才能获得更深入、更准确的把握。短期的制度变迁，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一个更长周期变迁中的一个阶段。以历史视角来认识中国当代的国家制度状况及其改革，可以避免研究周期过短所产生的片面认识。

经济学家研究历史，常常受到历史学家的指责——觉得经济学家对历史文献和史料不太重视。其实，很多经济学家是重视史料的，新经济史学更加



重视历史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他们可能用经济学的眼光搜索和处理史料。在历史学家看来重要的东西，经济学家可能觉得价值不大。但是，这种学科之间的史料取舍的差异，不是不充分尊重历史资料（特别是数据）和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数据的理由。在今后的研究中，本书作者应该可以更好地向历史学家学习，更好地利用历史学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历史计量方法或新经济史学方法，在作者的这一课题和以后相关课题研究中，应该得到很好的应用。

黄少安

2008年6月24日



前言 QIAN YAN

国家负责界定产权并对经济史中的繁荣和衰退负责，国家组织及其产权结构的变迁因此成为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线索。中国明清王朝期间，国家在统一与分裂、强大与衰退间的周期性变化为研究历史上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本书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明清王朝治乱循环的历史经验分析，揭示出国家组织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解释历史上国家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以及国家所界定的产权结构的演变规律。在本书的研究中：（1）提出并验证了解释王朝循环的内生交易费用假说；（2）用内生交易费用假说解释了明清管制型产权结构的演变规律，将财政制度、官员腐败、地方政府（官员）行为、贸易制度变迁、思想控制等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中；（3）以明清王朝的历史经验验证了中国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基于短期改革经验所获得的理论命题；（4）探讨了规范国家产生的条件，为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书对明清王朝治乱循环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以交易费用为主线，按照由外及内、由框架至细节的思路，从三个层次展开。

1. 国家组织形态的变迁。在最宏观的层次上，研究了军事技术和交易费用影响下的国家组织形态的变化和调整，提出了王朝循环的交易费用假说，为整个明清国家组织结构的变迁勾勒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按照本书的解释，国家的范围不是外生的地理变量，相反它是一个国家军事供给技术和内部组织成本的函数。在军事技术既定的前提下，国家的均衡点位于范围扩大增加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时。超过范围之后，国家规模即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在古代中国，保护的规模效益、协作治水、抵御风险、协调外部性以及对于统一市场的需求，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统一的收益，促使分裂的小国重新走向统一。但是，在前现代的技术条件下，统治者以有



限的资源维持辽阔疆域（众多人口）的统治，会受到交易费用的约束。为避免交易费用上升导致的国家不稳定，统治者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来加强对统治范围内的控制，如限制个体自由、抑制商业和贸易、实行思想控制等。这些短期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统治效率的制度，从长期来看，不但抑制了社会产出（意味着保护和其他公共品供应能力的降低，国家统一的收益下降）而且会不断内生出新的交易费用，使国家统一的收益和交易费用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国家的内在不稳定。同时，统治者用来强化社会控制的措施，如保甲制也提高了国家的竞争性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最终使这些竞争组织逐渐侵占国家的统治范围，国家重新走向分裂。这个过程是从边际上展开的，表现为国家保护、税收和作为第三方执行契约的范围逐渐被竞争者侵占。在前现代的条件下，中国始终不能克服统治范围和统治资源间的矛盾，因此只能在反复的治乱循环中徘徊。

2. 国家组织形态变迁中的产权结构调整。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研究了管制型制度的变迁规律。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受到交易费用的约束，并服务于统治者税收和权力控制的目的。暴力优势使国家和个人间的契约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国家产生之后的初始产权状态通常是在严格监督的等级制“类奴隶制”状态下开始的，并随着监督、控制费用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交易费用条件下，统治者的监督、控制成本不同，所界定的产权结构也因此不同。

在王朝的初期，统治者监督、控制官僚的费用较低，因此通过官僚体制直接征税、控制臣民，提供保护和法律等公共品，并确立了低税收、社会管制以及财政集权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它们构成了统治者维持大一统稳定的制度基础。其中，以低税收政策提供臣民合作的激励，以严格的管制降低征税和监督臣民的成本，以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提供实施管制的资源保障。

随着交易费用的上升，统治者对官僚和臣民的监督费用上升，统治者对权力的追求使他们不可能采取制度性分权或者赋予臣民经济自由的方式来节约监督费用，而只能通过默许官僚一定程度的腐败来强化官僚队伍的忠诚，防止他们卸责，结果造就了国家正式的财政税收制度之外的庞大的非正式资金体系，社会产权结构演变成轻徭薄赋、财政集权与腐败的三位一体。

非正式资金体系的运行使中央政府、国家与官僚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财政分权。官僚在分成比例的确定上，居于主导地位，在最大化假定之



下，他们会努力地扩大自身份额。并为此加强对基层纳税人的搜刮，导致黄宗曦怪圈的产生；或者有意识地来促进商业发展，以扩大税基，从而带来商业的繁荣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地方官员在非正式资金体系的驱使下，所主导制度变迁可能导致商业发展和农村基层被严重剥夺的混乱状态，那种认为地方官员推动的制度变迁一定会导向更有效率的产权状态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随着非正式资金体系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财政集权消亡，中央政府丧失维持社会管制的资源保障，原有的官僚体制转变成了事实上的包税人，征税的功能挤占了国家管理的功能，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明清型低税收、社会管制以及财政集权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彻底崩溃，统一王朝重新被分解成无政府状态的割据局面。

3. 产权结构调整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产权经济学为工具，从一个“超微观”的角度来分析明清管制型制度体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通过对产权束的分解来显示管制制度所产生的效果。管制造成个人产权的稀释，私人在最大化的假设之下，会对产权稀释所产生的浪费进行调整，并因此使一些重要的产权属性落入巴泽尔的公共领域中，被最靠近它们的人所攫取。从公共领域攫取财富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它不但导致了管制社会后期的无政府化，而且使一个封闭型社会的文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寻租特征，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偏离了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锁入到“高寻租低增长”的贫困均衡中。这是工业革命不能产生在中国（即李约瑟之谜）的原因所在。

明清王朝制度演变对当前改革的启示：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范围过大与统治资源不足间的矛盾，现代科学技术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成本，使国家不必通过严格的管制就能维持统一与稳定，从而为摆脱治乱循环提供了契机。但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机遇必须通过制度的整体变革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个国家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依赖于统治者和社会群体在权力使用上的利益相容，而后者又是经济增长和具体制度安排互动的结果。在中国当前的渐进式改革中，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以自由市场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向社会公众分配政治权力，形成广泛而分散的权力结构。

本书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坚持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来



研究具有整体特征的国家制度和制度变迁，接受国家的经济人假设，将历史制度的变迁归因于追求权力（税收）的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的博弈，强调制度变迁的边际分析。

中国历史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但迄今为止仍鲜有人涉足的领域，本书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尝试，并且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构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理论框架，来解释国家范围的变化、国家产权结构的调整以及这个过程的社会文化形态演变。这个理论框架不但可以解释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而且对于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制度变迁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启发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当代制度变迁问题时，一定要具有足够的历史感，不能把当前的制度变革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应该把它们嵌入到长期历史进程中去，这样才能获得关于制度变迁的更深入的理解，并制定出更合理的改革方案。

本书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首先，由于历史数据缺乏，本书的定量分析不足，无法通过计量分析为所提出的理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支持，而只能依赖于案例和统计数据描述，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理论的一般性。其次，由于作者学识所限，肯定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如果能够看到这些文献，本书的研究水平一定能够得到提高。希望读者能够指出本书的错误之处，以便于作者改正。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YCLE OF TURMOIL AND ADMINISTRATION: A REPREHENSIVE CASE FOR CHANGES OF 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TRUCTURE

States are responsible for defining property rights, and for the prosperity and recess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its stability and changes, its internal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the main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ycle of turmoil and administration provides an excellent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hrough analyz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urmoil administration cycle, to reveal the general changing laws of 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to explain the driving forces of national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history, and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laws of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defined by nations. This study, (1) puts forward and verifies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 hypothesis which explains dynasties' cycle; (2) uses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law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trolled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takes financial system, official corruption, provincial official activities, trade system evolution, mental control, etc. as endogenous variables and brings them into unified theoretical structure; (3) us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verify China'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oretical hypotheses based on short-term reform experiences; (4) discusses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normative countries can come into being,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gradual reforms.

Taking transaction cost as a main line, according to the clue from outside to inside, from framework to detai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cess from three levels.

1.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In the most macro lev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s and adjustment of nation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ransaction cost, proposes dynasty cycle's transaction costs hypothesis, and draws a ba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ntir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interpretation, the scope of a state is not an exogenous geographical variable, but rather it is a function of national military supply technology and internal organization cost. In the context of set military technology, with the expansion of scope, the equilibrium of state exists on the point that marginal cost and marginal revenue is equal. Beyond this scope, the size of a state is in instability. In ancient China, the economies of scale of protection, collaborative water - control, risks resistance,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united market,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 revenue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and urged small states to reunify. Howev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re - modern technology, the rulers maintain the control of vast territory (a big population) with limited resources, which will be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transaction costs. To avoid that the increase of transaction costs would lead to national instability, the rulers designed a series of institutions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such as restrictions on individual freedom, inhabitation of commerce and trade, the imposition of ideological control, etc.. In the long run, these institutions that short - term reduction in transaction costs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rules, have not only curbed social output (implying that the supply ability of protection and other public goods, and national reunification returns were reduced), but also continually generated new transaction costs, then the gap between revenue and transaction costs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has widened further, eventually led to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or secession. This process begins with margin,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tax and the scope as a third party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are gradually stolen by competitors. Under pre - modern conditions, China still can't overcom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ominated scope and resources, and therefore can only in the



cycle of turmoil and administration.

2. Property right restructure in changing nation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hanging national organization patterns, from the aspect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 institutions that reduction in transaction costs i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ontrol have affected the re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State's definition on property rights is restricted by transaction costs and is subject to the purpose of taxation and power control. Violent advantage makes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can't be reached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The initial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of a society usually begins under strict supervised hierarchy "like slavery", and evolves with the changes of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costs. Under different transaction costs conditions, the costs of rulers'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are different, so is the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In the early days of a dynasty, the cost of the ruler's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is lower, so the ruler directly use the bureaucracy to levy taxes, control subjects, and provide protection, law and other public goods, and establishes a three - dimensional system of low - tax, social control and financial powers, which constitute a stable system basis for the ruler to maintain great unification. Among these, the ruler uses low tax policy to encourage the cooperation of subjects, uses strict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to lower the cost of tax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subjects, uses a highly centralized financial system to provide resource protection for controls.

With the increase of transaction costs, the ruler's supervision costs will increase. The ruler's pursuit for power decides that he can't adopt institutional decentralization or give subjects economic freedom to save supervision cost, but only connive a degree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to strengthen the loyalty of bureaucratic ranks, prevent them from shirking their duties. As a result, there is a huge non - financial system outside official financial taxation systems, social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come into a three - dimensional system of thin corvee and low taxation, financial 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The function of informal financial system makes a de facto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exist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ureaucracies. Bureaucracies dominate in determining the proportion of distribution, in the maximum assumption;



they would expand their own share. And in order to do this, they would strengthen the extortion on grass – root taxpayers resulting in the generation of “Huang Zongxi weird cycle”; or they would inte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to broaden the tax base, thus bringing the business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freedom improvement. Driven by informal financial system, local officials’ institutional changes may lead to the chaos that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grassroots are severely deprived, that opinion that local officials’ institutional changes will promote a more efficient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is incomplete.

The proportion of informal financial system in all tax income is higher and higher, financial centralization vanishe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ses resource protection for maintaining social control, the former bureaucratic system has become the *de facto* tax packager, they not only levy exorbitant taxation, but also let taxation function gradually replace national regulatory functions, finally lead to the malfunction of state supervis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ree – dimensional system of low tax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financial centralization completely collapses; dynasty is divided into separatist non – government situation.

3. The impact of property right restructure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is paper takes property right economics as a t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uper – micro analysis, analyses the impact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trol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of property beam to present control system’s effect. Then this paper comes into the conclusion that: control causes personal property dilute; the privates, in the view of maximum assumptions, will adjust the waste generated by property right dilution, therefore make some important property right attributes into the Bazel’s public area, and will be seized by closest people. The behavior that seizes wealth from public area could reduce the waste of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run, its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far – reaching. It not only leads to non – government in the late controlled society, but also it makes a closed community culture take on a growing rent – seeking characteristics, ultimately a state’s development deviates from the path of economic growth, and will be locked into the “high – rent – seeking growth” poverty balance.

The revelat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to nowadays